



大会

Distr.: General
1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75(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
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人权维护者的处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根据大会第
[74/146](#) 号决议第 24 段以及人权理事会第 [42/16](#) 号决议第 3 段和第 6/29 号决议提
交的报告。

* [A/76/150](#)。



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的报告

各国否认：对人权维护者的长期拘留

对人权维护者使用长期拘留的趋势和模式

摘要

在本报告中，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分析了被长期拘留、服刑 10 年以上的人权维护者的处境。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造成人权维护者因正当人权活动而被长期拘留现象的根本因素。报告列举了人权维护者长期服刑的个案。特别报告员向相关利益攸关方提出了制止和扭转这种趋势的建议，并建议了防止今后发生这种情况的方法。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4
A. 数据和方法	7
B. 适用的法律框架	9
C. 与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有关的趋势	11
二. 结论和建议	22
A. 结论	22
B. 建议	22

一. 导言

1. 2015 年 12 月，大约 30 人在老挝驻曼谷大使馆外抗议，对老挝政府被指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妇女人权维护者 Lodkham Thammavong¹ 就是抗议者之一。
2. 三个月后，当她返回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时，她和另外两名人权维护者 Soukane Chaithad 和 Somphone Phimmasone 被老挝警方逮捕。
3. 特别报告员收到的可信信息表明，他们没有被告知自己所受的指控，在逮捕时或逮捕后也没有看到出示逮捕令。据报 Thammavong 女士和其他人被迫作出不实供述，在国家电视台上示众，为自己的叛徒行为道歉，并被剥夺了获得法律代表的权利。
4. 一年后，经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Thammavong 女士于 2017 年 3 月被判犯有“叛国罪、反国家宣传罪和扰乱社会秩序集会罪”。她被处以 12 年监禁。Chaithad 先生和 Phimmasone 先生也以同样的指控被定罪，分别处以 16 年和 20 年监禁。
5. 在撰写本报告时，Thammavong 女士被关押在距离万象约 60 公里的 Tan Piao 监狱，家人探视很困难。据说她难以得到水，而且仍然无法接触到律师。²
6. 不幸的是，这种打击人权维护者的现象并不少见。世界各地数百名人权维护者经过不公正的审判后被判犯有捏造的罪行，正在长期服刑。许多人同 Thammavong 女士一样得不到适当的法律代表。
7. 特别报告员监测了许多人权维护者服刑 10 年以上的案件，以及其他许多人权维护者面临的指控，他们可能因这些指控而被判处同样长的刑期。很多人同 Thammavong 女士一样，被判刑的罪名含糊不清，往往与叛国、颠覆或恐怖主义有关。
8. 许多人权维护者被关押在恶劣的条件下，并且(或者)被迫承认自己并未犯下的罪行。有些人健康状况不良，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一些人还不被允许家人定期探视。一些人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还有一些人在长期服刑期间死在监狱里。
9. 在本报告中，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希望表明，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的问题广泛存在，对人权维护者进行不公正监禁的方法有诸多共同特点，许多会员国——包括一些人权理事会成员或打算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的会员国——一贯否认其监禁人权维护者的做法。特别报告员就如何防止发生更多这种打击人权维护者的现象向各国提供咨询意见，并建议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权维护者。

¹ 本文件通篇提到特别报告员与其他特别程序发出的联合紧急呼吁和指控信。所有此类信函均可查阅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search/TMDocuments>。此案详情见 LAO 2/2021、LAO 1/2017 和 LAO 3/2016。

² 见 LAO 2/2021。

10. 这个问题的全面程度尚不清楚。各大洲都有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但很可能还有远远超过本报告所述数量的案件没有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

11. 本报告列举的案件只限于直接得到人权维护者本人或其家人或代表同意列举的案件。特别报告员还了解其他许多案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列入报告，这些原因包括无法取得同意或突出揭露案件可能会使人权维护者的处境更趋恶化。一些人权维护者是很久以前被监禁的，他们的案件已淡出公众视野，不再出现在很多倡导活动中。这也可能造成难以取得同意和信息。

12. 有各种情况的人权维护者在长期服刑。其中有劳工领袖，有律师，也有记者。有些人因捍卫《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一条而入狱，该条概述了人们在选举中投票的权利。其他人因和平倡导民主改革或揭露治理方面的缺陷而成为打击对象。特别报告员重申，和平维护这些权利以及各国承诺保障的其他权利从来就不是犯罪。³

13. 有些人权维护者因参与或有意参与联合国机制而受到打击报复并被监禁。其中一些人是著名人士和因其工作而获得国际奖项者，具有突出的国际形象，其他人则相对默默无闻，即使在本国国内也不为公众所知。一些人拥有双重国籍，是他们被监禁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公民。

14. 有些人权维护者是在大规模审判中被定罪，有些人是在缺席情况下被判刑。有些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人权维护者目前过着流亡生活，因为担心被捕而无法返回自己的国家。其他人处于审前长期羁押中，不知道自己是否或何时会面临可能导致长期监禁的指控。

15. 其他人权维护者被抓捕后，多年杳无音讯。并非所有人都是被政府拘留的。据信有些人是被民兵组织拘留的，例如叙利亚妇女人权维护者 Razan Zaitounch 就是这种情况，⁴ 多年来她一直下落不明。

16. 还有其他被判处长期监禁的人权维护者在关押期间死亡。2010 年，人权维护者 Azimjan Askarov⁵ 在吉尔吉斯斯坦被不公正判处监禁，10 年后他仍在监狱中，而且面临严重健康问题。虽然任务负责人、联合国、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吁请当局以健康理由将他释放，但他已于 2020 年在关押期间死亡。

17. 特别报告员指出，当人权维护者被捕或被定罪时，往往会引起一系列关注和活动，有时会伴有国际媒体的密集报道以及外国政府和联合国机制的发声宣传。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即使是最著名的人权维护者所受到的关注也会淡化，因为新的案件需要非政府组织、联合国独立专家和有兴趣的政府给予关注和投入资源。

³ 见 www.un.org/en/about-us/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 以及《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另见大会第 53/144 号决议，第 1、2、3 条。

⁴ 见 SYR 7/2013。

⁵ 见 KGZ 1/2011 和 KGZ 2/2020。

18. 很多长期服刑的人权维护者感到自己被遗忘或遗弃了。
19. 人权维护者遭受长期拘留的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对他们本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社区和他们所属的民间社会都是如此。仅仅是打一场官司就可以耗尽人权维护者和他们的非政府组织的资源。实际上，这种对人权维护者及其工作的损害往往也是对其进行打击的动机。
20. 各国不妨回顾，特别报告员在她 2020 年提交大会的第一份报告(A/75/165)中概述了她的优先任务领域，其中包括侧重于“遭长期监禁的人权维护者”。她认为，各国早就应该面对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国家无视多年来要求停止监禁人权维护者的呼吁，仍然拒绝释放其目前拘留的人权维护者。
21. 特别报告员受命研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权利方面的发展情况和挑战，寻找、接收和回应有关人权维护者处境的信息，并就更好地保护人权维护者的有效战略提出建议。
22.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权维护者，给各国的一个简单建议是，不要因为他们和平维护他人权利而将其长期监禁。
23. 很多国家判处人权维护者长期监禁，是因为想这样做，也是因为能够这样做。之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这些国家不满人权维护者揭露腐败、指出侵犯人权行为或强调治理中的其他缺陷。
24. 监禁人权维护者并不总能让他们沉默，一些人在被拘留期间继续维护权利，但各国经常使用这种打击人权维护者的方法来镇压和平异见人士。⁶
25. 各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无视其承诺遵守的国际条约，而在国际社会承担的后果往往微不足道。各国往往以国家安全或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通过模糊的法律，作出不符合国际标准的虚假审判，用酷刑迫使人权维护者做出不实供述，就人权维护者的工作撒谎，从而得以监禁人权维护者。⁷
26. 一些国家争辩说，被监禁的人不是人权维护者，而是颠覆者、叛徒或恐怖分子。特别报告员了解其间的区别，她恭敬地提醒各国，她在辨别谁是、谁不是人权维护者方面已有多年经验，这是她被委托承担这项任务的部分原因。特别报告员恳切希望与各国讨论个案，以便更好地解释为什么本报告中提到的被拘留者是人权维护者。
27. 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她经常向会员国提交许多关于目前正在长期服刑的人权维护者的详细案件，但在她吁请会员国向本报告提交资料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长期拘留任何人权维护者。

⁶ 人权维护者在狱中设法为人权工作的实例见 www.humanrightsfirst.org/resource/activism-prison。

⁷ 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的一份报告(A/HRC/40/52)中提到了使用“过于宽泛的恐怖主义定义”的问题，指出“各国执行安全理事会反恐框架的明显趋势是在全球出现了过于宽泛、含糊不清的恐怖主义定义”，“这些法律可能把合法的表达方式定为刑事罪”。

28. 很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实行这种打击人权维护者的做法。自 20 年前确立这项任务以来，前任特别报告员一再建议各国不要用不公正审判或以安全立法为借口监禁或以其他方式打击人权维护者。

29. 2001 年，第一任人权维护者状况任务负责人希纳·吉拉尼在她提交给当时的人权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中说：“人权维护者的情况……及其在不公正审判后的获刑都是特别代表极为关注的事项” (E/CN.4/2001/94，第 89(f)段)。

30. 尽管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多年来一直就这种不公正做法定期向会员国报告最新详情，但人权维护者仍然经常受到不公正审判，许多人经审判后被判处长期监禁。

31. 在今年早些时候提交人权理事会的最近一份报告(A/HRC/46/35)中，特别报告员重点讨论了人权维护者被杀害的问题。她指出，会员国缺乏对施害者追责的政治意愿，是谋杀行为的关键驱动因素。就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的情况而言，与其说是缺乏防止这种虐待行为的政治意愿，不如说是国家实际存在打击人权维护者的政治意愿。

32. 针对特别报告员提出不公正审判的情况，一些会员国代表告诉她，他们不能干涉本国的独立司法程序。特别报告员尊重司法独立原则，但是，当刑事司法系统未遵守国际标准而且被用来不公正地监禁人权维护者时，她不能沉默。

33. 2003 年，吉拉尼女士告诉会员国：“如果根据安全立法对人权维护者进行逮捕、拘留和(或)起诉，这一过程应完全透明。应公布逮捕和拘留所依据的罪名并予以充分全面的解释，由独立人士核查其是否确凿” (A/58/380，第 71 段)。

34. 很多国家仍然未能通过这一透明度检验，而继续将人权维护者打入多年的牢狱之灾。

35. 那些使长期和不公正拘留成为可能的机制，包括酷刑、不公正审判以及对和平维护他人权利者所做的工作的严重歪曲，固然应该消除，但是，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这种做法是出于政治意愿。

36. 用长期监禁来打击人权维护者，始终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一条任何国家都不可逾越的红线。这种做法不道德、非法、不可原谅、有损名誉。这种做法暴露了各国缺乏遵守其承诺维护的国际标准的决心。将和平维护人权者送进监狱，令人严重质疑各国是否有意遵守其签署的国际协定。

A. 数据和方法

37. 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就 148 名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情况向 22 个会员国发出了 28 封信函。被拘留者包括 37 名妇女人权维护者和 110 名男性人权维护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还追踪到一名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这名人士的身份认同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

38. 在这 148 名人权维护者中，有 40 人是处理人权案件的律师，15 人从事妇女人权工作，9 人从事维护环境和土著人民权利的工作，7 人从事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其他各类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从事的工作包括维护以下各种权利：少数群体权利；儿童权利；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者权利；移民；宗教自由；自决权；废除死刑；劳工权利，以及其他权利。

39. 在所有人权维护者中，104 人被定罪，44 人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以上刑期。54 人被控犯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53 人被控违反反恐法，30 人被控同时违反国家安全和反恐法，11 人被控犯有谋杀、抢劫、敲诈勒索、绑架、亵渎以及其他罪行。

40. 按区域分列的数字显示，向亚太地区 5 个国家发送了 6 封信函(21.42%)，向美洲 5 个国家发送了 5 封(17.86%)，向欧洲和中亚 4 个国家发送了 5 封(17.86%)，向中东和北非 4 个国家发送 5 封(17.86%)，向非洲 4 个国家发送了 7 封(25.00%)。

41. 在编写本报告时，就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问题已经或正在准备向 24 个国家发送信函：巴林(关于 5 名人权维护者)；白俄罗斯(3 名)；布隆迪(1 名)；喀麦隆(1 名)；中国(17 名)；埃及(12 名)；厄立特里亚(1 名)；洪都拉斯(2 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7 名)；吉尔吉斯斯坦(1 名)；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3 名)；墨西哥(8 名)；摩洛哥(4 名)；尼日利亚(1 名)；尼加拉瓜(2 名)；秘鲁(2 名)；俄罗斯联邦(3 名)；卢旺达(1 名)；沙特阿拉伯(20 名)；塔吉克斯坦(1 名)；土耳其(24 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6 名)；乌兹别克斯坦(3 名)；越南(38 名)。

42.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收到对发出的 28 份信函的 11 份答复。在收到的答复中，绝大多数是完全实质性或部分实质性的。“实质性答复”一词是指对相关指控作出全部或部分答复和(或)

实质性澄清事实的回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采取的行动一定符合国际人权法。

43. 本报告的依据包括特别报告员自 2020 年 5 月开始执行任务以来与世界各地数百名人权维护者进行的讨论，以及她不断收到的关于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的趋势的资料。

44. 人权维护者、各国、非政府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方面与她分享了他们对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情况的看法和信息。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在网上进行了磋商。特别报告员还呼吁提交书面材料，⁸ 邀请相关利益攸关方为本报告提供投入。

45. 她总共收到 59 份投入资料，其中 8 份来自会员国，7 份来自国家人权机构，37 份来自民间社会组织，3 份来自人权维护者，4 份来自国际组织。

46. 特别报告员感谢所有为报告提供投入者。她还使用了关于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以及被拘留之前受到威胁的现有文献和研究材料。其他资料来源包括以前任

⁸ 见 www.ohchr.org/EN/Issues/SRHRDefenders/Pages/longterm-detention-defenders.aspx。

务负责人关于人权维护者处境的报告、与其他相关任务负责人编写的报告和进行的协商以及区域人权保护机构的报告。

47. 就本报告而言，特别报告员对“长期拘留”一般界定为至少 10 年。本报告主要关注被判处 10 年以上刑期，或正在连续服 10 年以上刑期，或目前在押并有可能被判处 10 年以上刑期的人权维护者。

B. 适用的法律框架

48. 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的做法违反了若干国际人权标准。

49. 特别报告员提醒各国，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人权维护者宣言》)。

50. 《人权维护者宣言》确认了在和平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第 1、5 和 13 条)。该《宣言》还强调，每个国家在保护、促进和实现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第 2 条)，并且，在以和平手段对造成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可归咎于国家的活动和作为，包括不作为作出反应或表示反对时，人人有权单独和与他人一起受到国内法律的有效保护(第 12 条)。

51. 为惩罚合法行使《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权利的活动而实行的逮捕或拘留属于任意逮捕或拘留，这类权利包括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第十九条)、集会自由权(第二十一条)、结社自由权(第二十二条)以及隐私权(第十七条)。

52.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是《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第一项实质性权利，它显示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深刻和重要意义。⁹

53. 剥夺自由应受某些条件制约，如果不定期审查，即使是最初的合法拘留也会变成任意和违法拘留。无限期拘留显然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相抵触。虽然《公约》第四条允许暂时减免履行这一规定，但只有在“经……宣布紧急状态，危及国本”的情况下，方可“在此种危急情势绝对必要之限度内”采取这种克减措施。被剥夺自由者有权立即接受审判或得到释放，如发生任意拘留则有权获得赔偿。反恐战争或限制性移民政策都不能证明无限期拘留是合理的。¹⁰

54. 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经常试图以“国家安全”、“紧急状态”、“非法移民”和其他所谓特殊情况为这种非正常监禁辩解。暂时克减适用法律制度的某些条款是可能的，但要符合特定条件，特别是“经……宣布紧急状态，危及国本”

⁹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 段。

¹⁰ Alfred de Zayas, “Human rights and indefinite deten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7, No. 857 (March 2005)。

这一标准以及相称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这种克减应限制“在此种危急情势绝对必要之限度内”。克减不能是无限制的，而必须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加以限制。¹¹

55. 《公约》第九条申明，每个人都有人身自由和安全权，任何人都不应受到任意逮捕或拘留，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捕时应被告知逮捕的理由，并立即被告知对他们的任何指控。

56. 第九条还申明，任何被逮捕或拘留的人，应被迅速带见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

57. 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羁押妨碍迅速见法官，本身就违反第九条第三项。一旦被拘留者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官就必须决定，是将此人释放，还是还押以待更多调查或等候审判(即人身保护令(第九条第四项))。如果没有继续拘留的法律依据，法官必须命令释放。拘留候审人员不应作为一般规则，而应作为例外情况。

58. 《公约》第十四条详述了在法院和法庭面前平等的权利，以及公正审判权。被指控刑事罪行的个人应毫不拖延地受审(第十四条，第三项(寅)款)，并应有权获得自己选择的法律援助。公正审判的概念包括公正和公开审讯保障。¹² 在明显不公正的审判后实施的监禁属于任意监禁。

59.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一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应遭到强迫失踪。¹³ 强迫失踪违反《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多项实质性和程序性规定，是一种特别严重的任意拘留形式。此外，若干标准和原则也对囚犯待遇作出了规范。¹⁴

60. 审前长期羁押，以及根据与国家安全和反恐有关的定义模糊的规定予以长期拘留，也违反了法治。根据人权法的要求，将恐怖主义行为定为刑事犯罪的立法应向公众公布，制定过程力求精确，仅适用于反恐，不具歧视性和追溯力。(A/HRC/45/27，第 15 段)。¹⁵

61. 司法制度的独立，还有司法制度的公正和廉正，也是维护法治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且是确保司法工作不歧视的必要先决条件(大会第 67/1 号决议，第 13 段)。

62. 规范反恐、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保护国家安全的国际和国内法律框架对民间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反恐中注意促进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强调，安全理事会应积极促进民间社会作为变革力量发挥关键作用，并提醒各国有义务保护民间社会(A/HRC/40/52，第 18 段)。

¹¹ 同上。

¹²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第 25 段。

¹³ “强迫失踪”的定义见《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

¹⁴ 这些标准和原则包括《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囚犯待遇基本原则》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¹⁵ 另见 A/HRC/28/28，第 28 段；大会第 72/180 号决议，第 5(o)段；A/HRC/8/13，第 19-23 段。

63. 安全理事会和各国都应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毫不含糊地使人道主义行动免受反恐措施的影响(A/HRC/40/52, 第 22 段)，决不能把人道主义保护和援助以及人权宣传视为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得据此予以镇压或定罪。

64. 很多国家制定并实施了广泛而模糊的反恐立法，其中往往不要求将暴力行为作为恐怖主义必备特征。这类法律有时明确包括受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行为，例如合法行使言论、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

65. 在一些立法中，恐怖主义的定义包括诸如“侮辱国家名誉”等行为，这可能导致将任何批评政府或政府政策的言论定为刑事犯罪。其他涉面宽泛的立法规定了新的罪行，如“鼓吹”、“鼓励”、“美化”或支持恐怖主义，这可能导致对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不必要或过度的干预(A/HRC/45/27, 第 16 段)。

C. 与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有关的趋势

1. 反恐及相关立法被广泛滥用的证据

66. 特别报告员对美洲、亚太、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 13 个国家的 61 起案件进行了研究，这些案件中的人权维护者被判处 10 年以上刑期，有的仍在服刑，有的已经死在狱中，有的从一开始就没有被判刑，但被国家长期拘押，这些情况显示的模式令人担忧。

67. 在研究的案件中，77%的案件根据反恐或国家安全立法对所涉人权维护者定罪。至少 46%的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指称他们在被捕或拘留期间受到虐待或酷刑。四名人权维护者在狱中死亡或在送往医院后立即死亡。此外，有 11%的案件涉及因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而遭到报复，已列入秘书长关于报复行为的报告。

68.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所有被指控或被判定犯有重刑罪行者的案件还有更多共同之处。

69. 虽然各大洲的人权维护者被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根据各种不同法律予以长期拘留，但特别报告员发现了导致能够实施这种拘留的类似的程序机制。

70. 许多人权维护者受到的指控、起诉或判刑是根据模糊不清、定义不当的法律，常常与颠覆、叛国或恐怖主义挂钩，这种做法违反了上述国际标准。

71. 例如在土耳其，《土耳其刑法》第 314 条和《反恐怖法》第 7 条被广泛用于压制人权维护者，将其归类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2020 年 3 月，妇女人权维护者 Sevda Özbingöl Çelik¹⁶ 被捕，并被正式指控“参加武装恐怖主义组织”，受到 9 个月的审前羁押。起初，她被允许接触律师；然而，第一个月过后，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不被允许见律师。家人探视也被禁止，估计她被单独监禁了两个半月。2021 年 4 月，她被判处 11 年零 6 个月监禁，罪名是“参加恐怖主义组织”(《土耳其刑法》第 314/2 条)、“违反关于集会和会议的第 2911 号法”(第 2911 号法第

¹⁶ 见 TUR 10/2021。

28 条)以及“恐怖主义宣传”(《反恐怖法》第 7/2 条)。她是一名和平的人权维护者,不是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但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她和其他人是人权维护者。

72. 在中国,通常根据《刑法》中的国家安全条款对人权维护者进行指控。特别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和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监禁期限被用来判处人权维护者长期监禁。

73. 《刑法》中的“首要分子”、“罪行重大”、“情节严重”等概念宽泛而模糊。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和第一百二十条之一对监禁时间不设上限,不符合法律确定性原则,而且因此允许判处长期监禁。人权维护者陈西、¹⁷ 刘晓波、¹⁸ 李旺阳、¹⁹ 张海涛²⁰ 和秦永敏²¹ 被依据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定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11 年、10 年、19 年和 13 年。一些人被依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指控“寻衅滋事”。同时,妇女人权维护者李翹楚²² 以及人权维护者常玮平、²³ 许志永、覃永沛和丁家喜目前也是以上述罪名指控被起诉。

74. 在埃及,对人权维护者的指控通常包括加入某个未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可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第 12 条或《刑法》第 86 条之二予以处罚),以及(或者)发布虚假新闻和向国际机构提供虚假信息(《刑法》第 80 条 D 款和(或)第 102 条之二和第 188 条)。²⁴

75.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很多长期判决是根据宽泛的国家安全条款作出的。“反国家宣传罪”(《刑法》第 500 条)、“间谍罪”(第 501 条)、“集会和串通危害国家安全罪”(第 610 条)以及“侮辱最高领袖罪”(第 514 条)可能导致 1 至 10 年刑期。²⁵

76.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根据各种法律,包括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罪行的 2014 年第 7 号联邦法,人权维护者可能被判处 10 年以上监禁。该法律模糊不清,没有对恐怖主义作出定义,而是用诸如“违背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反对国家”和“损害民族团结”等措辞来界定恐怖主义,也没有进一步加以阐明。²⁶

77.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 100 多名人权维护者的资料,他们或是被判处 10 年以上监禁,或是因可能导致类似刑期的指控而被拘留。还有其他很多正在服刑的人权维护者,任务负责人没有收到足够的资料,无法将他们的案件列入本报告。

¹⁷ 见 CHN 4/2021。

¹⁸ 见 CHN 4/2021、CHN 1/2010、CHN 50/2008、CHN 60/2004 和 CHN 43/2004。

¹⁹ 见 CHN 6/2012。

²⁰ 见 CHN 4/2021。

²¹ 见 CHN 4/2021 和 CHN 5/2011。

²² 见 CHN 4/2021。

²³ 见 CHN 4/2021、CHN 20/2020、CHN 29/2010 和 CHN 12/2005。

²⁴ 见 EGY 5/2021。

²⁵ 见 IRN 12/2021。

²⁶ 见 ARE 3/2021。

78. 虽然本报告不能说明所有正在长期服刑的人权维护者的处境，但从任务负责人已收到足够信息并经人权维护者对处理其案件给予必要同意的案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一些趋势。

2. 人权维护者被判死刑

79. 一些人权维护者被指控犯有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80. Jamila Loukil 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名记者，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的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Said Boudour 是一名人权维护者，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成员。Kaddour Chouicha 是一名人权维护者、大学教授和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副主席。²⁷

81. 根据收到的资料，上述三人于 2020 年 4 月因其人权工作被捕，并被控犯有各种罪行，包括与颠覆活动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根据《刑法典》第 77、78、87 和 96 条)。他们因参加和平抗议而受到盘问。如果被定罪，他们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82. 人权维护者 Mubarak Bala²⁸ 是一名无神论者，于 2020 年 4 月在尼日利亚被捕。法院于 2020 年 12 月裁定他将获得保释，但在本报告编写时他仍因亵渎神明的指控被拘留，但没有正式指控。²⁹

83.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他可能会因亵渎神明的指控而被起诉，该指控可能会导致死刑，并指出报告员收到的资料显示，他不断受到死亡威胁。

3. 人权维护者在被拘留期间死亡

84. Azimjan Askarov³⁰ 在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受到残酷和不公平的待遇，导致他因健康原因在狱中死亡，当局曾多次收到有关其健康状况以及 COVID-19 风险的提醒。还有其他人权维护者在拘留期间死亡，要么是在候审期间，要么是在长期服刑期间。

85. 人权维护者 Samuel Ajiekah Abuwe³¹ 于 2019 年 8 月在喀麦隆被捕，可能面临恐怖主义指控，最高可判处 13 年监禁。他于 2020 年在喀麦隆在押期间死亡，未被正式指控。

86. 郭宏伟³² 是一名揭露中国政府官员涉嫌腐败行为和倡导中国香港民主的人权维护者。2016 年 4 月，他在 52 岁时因“敲诈政府和勒索”以及“寻衅滋事”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

²⁷ 见 DZA 4/2021。

²⁸ 见 NGA 3/2020 和 NGA 2/2021。

²⁹ 见 NGA 2/2021。

³⁰ 见 KGZ 1/2011 和 KGZ 2/2020。

³¹ 见 CMR 2/2020。

³² 见 CHN 4/2021、CHN 4/2016、CHN 29/2010 和 CHN 43/2006。

87. 据报，他于 2020 年 5 月被单独监禁。他的家人就他被单独监禁以及总体而言生活条件差，包括缺乏食物和挨冻提出了申诉。2021 年 4 月 9 日，郭先生在吉林省一家医院死亡，此前他接受了治疗脑出血的脑部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³³

88. Abdullah Hamid al-Hamid 是沙特阿拉伯一名人权维护者，在被关押期间于 2020 年 4 月死亡，当时他正在因与其人权工作有关的国家安全指控服刑，刑期 11 年。³⁴ Al-Hamid 先生多年受多种心脏疾病影响，于 2020 年 1 月被送往医院。

89. 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医生建议他急需接受心脏手术。尽管医生提出了上述建议，据称监狱管理部门仍将他带回监狱，并通知他手术将推迟数月。据报，他要求手术前留在医院的请求遭到拒绝，并且没有因 COVID-19 大流行而考虑将他提前释放。2020 年 4 月 9 日，Al-Hamid 先生在牢房中风，进入昏迷状态。他被送回医院，一直处于危急状况，直至两周后死亡，死时 69 岁。

90. 2021 年 7 月 5 日，84 岁的耶稣会教士和人权维护者 Stan Swamy³⁵ 在印度被关押期间死亡；他于此前 9 个月被逮捕，并被控犯有涉及恐怖主义的罪行，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在他被拘留期间，当局拒绝给予他适足的医疗服务。

4. 人权维护者在被拘留期间遭酷刑

91. 在任何情况下对人权维护者实施酷刑都不可接受。对许多人权维护者实施酷刑是为了获取不实供述。

92. 在摩洛哥，人权维护者 Khatri Dadda³⁶ (2020 年被判处 20 年监禁)、Al-Hussein al-Bashir Ibrahim³⁷ (2019 年被判处 12 年监禁)、Yayha Mohamed Elhafeed Iaazza³⁸ (2008 年被判处 15 年监禁)和 Naama Asfari³⁹ (2013 年被判处 30 年监禁)都曾开展和平倡导西撒哈拉自决权的工作。

93. 每个人的活动都包括参加支持这一目标的和平示威。一些人还开展了其他人权工作。在所有案件中，都存在涉及以下方面的正当程序关切：出示逮捕令、接触律师、与家人联系和证据。

94. 据称刑讯逼供所获供词构成了针对 Khatri Dadda、Naama Asfari 和 Al-Hussein al-Bashir 的案件的一部分。据称，在收集对 Yayha Mohamed 定罪的证据时也使用了酷刑。

³³ 见 CHN 4/2021。

³⁴ 见 SAU 6/2021。

³⁵ 见 IND 18/2020 和 IND 10/2021。

³⁶ 见 MAR 3/2020 and MAR 4/2021。

³⁷ 见 MAR 2/2020。

³⁸ 见 MAR 5/2020。

³⁹ 见 MAR 4/2021。

95. 巴林的人权维护者 Naji Fateel⁴⁰ 于 2013 年 5 月被捕，据报被带往“刑事调查大楼”，在那里他被戴上手铐并被蒙上双眼。消息来源报告说，Fateel 先生在刑事调查大楼期间遭受酷刑，包括电刑、模拟溺水、殴打、绑住双手悬吊在天花板上、性骚扰和强奸威胁。

96. 2013 年 9 月，根据《反恐法》第 6 条，他因曾被撤销的指控被判处 15 年监禁。2015 年 3 月，在 Jau 监狱发生一起事件后，Fateel 先生因“伤害罪”和“损坏监狱财产”被不公正地额外判处 10 年监禁，合并刑期 25 年，目前正在服刑。

5. 有双重国籍的公民

97. 一些在监狱长期服刑的人权维护者有另一个国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得到了正义。

98. Abdulhadi al-Khawaja⁴¹ 是巴林和丹麦公民。他于 2011 年被捕，在与其他 20 人一起接受大规模审判后被军事法庭定罪。

99. 在他被拘留和判刑之前，他在麦纳麦的和平抗议活动中发表了一次演讲。

100. 审判期间不允许他提供自己的证人或为自己作证，尽管他告知法庭，他在被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据报，他脸部侧面有四处骨折，由于在拘留期间受伤，进食仍有问题。

101. 由于 2011 年面部骨折和相关手术引起的问题，他在监狱里的健康状况、尤其是下巴的情况继续恶化。

102. Dawit Isaak⁴² 是厄立特里亚和瑞典公民。在被拘留之前，他在厄立特里亚宣传表达自由。根据收到的资料，他于 2001 年 9 月被拘留，此前他的报纸报道了有关在厄立特里亚举行选举的呼吁。

103. 许多年来他生死未卜，但特别报告员 2020 年 9 月得到可靠消息，他还活着，被关在 Eiraeiro 监狱，这座偏远的监狱因极其恶劣的条件而闻名。

104. 有多份报道称，Isaak 先生在被拘留期间被单独监禁并遭受酷刑。厄立特里亚政府不允许任何人进行探视。在编写本报告时，还不清楚 Isaak 先生被控犯下何种罪行，他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监禁了近 20 年。

105. 遗憾的是，丹麦和瑞典政府没有以足够积极的方式开展倡导努力，以推动释放这些人权维护者。本来可以开展更多工作，而且仍应开展更多工作，以探索使人权维护者立即无条件获释的途径。

⁴⁰ 见 BHR 2/2021。

⁴¹ 见 BHR 2/2021 和 BHR 5/2004。

⁴² 见 ERI 3/2021。

106. 2021 年 1 月，加拿大下议院投票，给予沙特人权维护者 Raef Badawi⁴³ 加拿大公民身份，此人目前正在服刑，刑期 10 年。2021 年 4 月，意大利参议院投票，给予埃及人权维护者 Patrick Zaki⁴⁴ 意大利公民身份，此人目前在埃及被审前羁押。

6. 案例研究

107. 以下案例是在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方面反复出现的模式的例证。

108. 一些人权维护者被判刑，而另一些人正在候审，但其起诉或指控涉及可被长期监禁的罪行。以下事例均来自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最近与其他任务负责人联合发出的信函。

白俄罗斯

109. Maria Rabkova⁴⁵ 是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Viasna”人权中心志愿协调员，她于 2020 年 9 月在白俄罗斯被捕。自 2020 年 8 月总统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开始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该人权组织的志愿者网络一直在监测尊重和平集会权的情况。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她还参与记录被拘留示威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情况，因“训练或以其他方式让民众准备好参加大规模骚乱”的指控而被拘留。

110. 2021 年 2 月，对她提出了另外两项罪名的指控，即“参与犯罪组织”（《白俄罗斯刑法典》第 285 条第 2 部分）和“旨在煽动基于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或其他社会关系的种族、民族、宗教或其他社会仇恨或不和谐的蓄意行为”（第 130 条第 3 部分）。据称后一项指控与她批评国家机构有关，原因是据报白俄罗斯的公务员和警察可被视作社会团体，因此在仇恨犯罪立法所涉范围内。Rabkova 女士将面临最高 12 年的监禁，并且不得讨论有关其案件的进一步细节，因为她签署了一项不披露协议。

中国

111. 陈西⁴⁶ 是一名作家、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他于 2011 年 11 月被捕，2011 年 12 月他 57 岁时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罪名是众所周知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12. 陈先生开展的人权倡导工作与他目前的定罪和先前的两次定罪有关。迄今为止，陈先生共计被判处有期徒刑 23 年。据报，陈先生受到虐待，可能遭受酷

⁴³ 见 SAU 6/2021 和 SAU 5/2016。

⁴⁴ 见 EGY 19/2020 和 EGY 10/2020。

⁴⁵ 见 BLR 4/2021 and BLR 8/2020。

⁴⁶ 见 CHN 4/2021、CHN 4/2016、CHN 1/2012、CHN 29/2010、CHN 34/2009、CHN 14/2006 和 CHN 13/2004。

刑，包括被狱友骚扰和单独监禁。他患上慢性肠炎，导致腹泻、脱水和发烧。每年冬天，他的手、耳朵和腹部都有严重冻伤。

埃及

113. Hoda Abdel Moneim Hassan⁴⁷ 是一名 61 岁的律师和人权维护者，尤其因有关妇女和儿童权利的工作而闻名。

114. 自 2018 年 11 月被拘留以来，她一直不能接听电话或接受探视，也不能给家人发信或接收家人的信件。根据收到的资料，自被拘留以来，她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她患有高血压，有肾脏问题和其他健康问题，包括深静脉血栓。2020 年 1 月，据报她出现心脏病发作迹象，并因此被送往监狱医院。一名专科医生建议她接受紧急超声心动图检查，但检查从未进行。

115. 2020 年 9 月，她的家人获得口头批准，可以去 Al-Qanater 监狱探视，但在抵达时却被告知探视取消，可以留下给她的药品和钱。

116. 2020 年 11 月，她因剧烈疼痛被转往 Al-Manial 医院，被告知一侧的肾衰竭，另一侧的肾功能不正常。监狱当局未将她随后进行的检查告知她的家人。

117. 2020 年 12 月，在延长审前羁押的庭审期间，据报她行走困难，并有忍受剧痛的迹象。她告知法官，监狱诊所设备不佳，无法满足她的医疗需求。她的审前羁押继续每 45 天延长一次，尽管时间已超过没有审判情况下两年的法定期限。

洪都拉斯

118. Jennifer Sarina Mejía Solórzano 和 Marianela Mejía Solórzano⁴⁸ 是来自加里富纳土著社区的一对姐妹和妇女人权维护者，也是洪都拉斯黑人互助组织成员。据称，对这些人权维护者定罪与她们为捍卫加里富纳人的人权所做工作有关。

119. 2021 年 3 月，Jennifer Sarina Mejía Solórzano 在前往圣达菲市的途中被捕，并被控对加拿大 Sociedad de Responsabilidad y Bienes Raíces 公司犯有“侵占土地”（《刑法典》第 227 条）、“损害”（第 254 条）和“威胁”（第 207 条）罪。另外她还被指控犯有“盗窃罪”（第 218 条）。

120. Marianela Mejía Solórzano 去警察局询问姐姐 Jennifer Sarina Mejía Solórzano 的消息，也以同样罪名被逮捕。两人都面临 10 年以上监禁。根据洪都拉斯《刑法典》，犯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罪行者应受到与各项罪名相对应的所有处罚。

⁴⁷ 见 EGY 2/2021 和 EGY 6/2019。

⁴⁸ 见 HND 3/202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121. Nasrin Sotoudeh⁴⁹ 是一名妇女人权维护者，也是一名律师，就以下法律案件开展工作，即为挑战强制妇女佩戴面纱的法律和被剥夺公平审判权的人进行辩护。她还倡导反对死刑，特别是对不满 18 岁的涉嫌犯罪者判处的死刑。

122. 她自 2018 年 7 月以来一直被监禁，目前正在因 7 项与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相关的罪行服刑。因上述罪名，她须按照所判最长刑期即 12 年服刑。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结束 46 天的绝食抗议以来，Sotoudeh 女士的心脏和肺部一直有严重问题。2020 年 9 月住院 5 天后，她三次获准暂时休假，但在仍患病的情况下被送回监狱；据报，自将她送回监狱后，一再拒绝向她提供适足的医疗服务。

123. Esmail Abdi⁵⁰ 是一名劳工权利维护者，曾任伊朗教师同业公会秘书长，这是伊朗最大的教师权利组织。他与该公会一起，为学生和教师争取工会权利，包括为此组织和参加和平示威活动。

124. 自 2006 年以来，Abdi 先生多次入狱。2011 年，他因“反国家宣传”和“间谍罪”被判 10 年监禁，缓刑 5 年。2016 年 10 月，在缓刑期即将结束之际，他被判犯有“反国家宣传罪”、“串通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 6 年，须服刑 5 年。据报，在 2016 年审判之前，不允许这名人权维护者的律师查看针对他提出的证据。他在 2020 年 3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期间因 COVID-19 被临时准假，但 2020 年 5 月被告知 2011 年的最初 10 年刑期将于 2021 年 1 月他目前的 5 年刑期结束时生效。

125. 先前的刑期结束以及 10 年刑期开始的时间是 2021 年 1 月 11 日。

126. Abdi 先生曾多次绝食，抗议监狱的条件。他最近一次绝食是 2021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抗议对他打电话实施限制。

127. 2020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 17 日，据报 Abdi 先生多次被从原来的埃温监狱转移到其他监狱和牢房。据报，他和其他 30 名囚犯被关在 Albroz 中央监狱一间隔离牢房内。在编写本报告时，他被转移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

沙特阿拉伯

128. Waleed Abu al-Khair⁵¹ 是一名人权律师，曾担任沙特阿拉伯人权监测组织负责人。该组织是 2008 年成立的一个独立人权组织。他第一次受审是 2011 年底，此前他签署了一份声明，批评当局迫害 16 名改革派人士。2013 年 10 月，他受到指控，罪名与他曾被定罪的罪名几乎相同。这些罪名包括“违背对统治者的忠诚

⁴⁹ 见 IRN 16/2021、IRN 14/2021、IRN 12/2021、IRN 21/2020、IRN 6/2020、IRN 11/2018、IRN 10/2018、IRN 6/2013 和 IRN 18/2012。

⁵⁰ 见 IRN 12/2021、IRN 21/2020 和 IRN 10/2016。

⁵¹ 见 SAU 6/2021、SAU 3/2020、SAU 12/2017、SAU 4/2016、SAU 14/2014 和 SAU 5/2014。

和不服从统治者”、“设立无证组织”和“参与设立另一个组织”，即沙特公民和政治权利协会。

129. 2013 年 10 月，吉达的刑事法院判处他 3 个月监禁。2014 年 4 月，他在出席审判期间的第五次审讯后再次被捕。他被带到利雅得 Al-Ha'ir 监狱，据报被单独监禁并被虐待。

130. 2014 年 4 月，他的辩护团队去法院询问他被拘留的原因，发现他正在出席第六次审讯。据报，法官拒绝解释为何将他逮捕和拘留。

131. 2015 年 1 月，Al-Khair 先生最终被判处 15 年监禁、15 年旅行禁令和罚款，罪名是“不服从统治者并试图否认统治者的合法性；侮辱司法机构和质疑法官的诚信；设立无证组织；与国际组织沟通，损害国家声誉；编制、存储和发送危害公共秩序的信息”。

土耳其

132. Erol Önderoğlu⁵² 有法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是一名人权维护者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驻土耳其通讯员。他也是一名名为 Bianet 的土耳其网站的编辑，该网站报道土耳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事务，尤其关注土耳其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妇女权利。

133. Şebnem Korur Fincancı⁵³ 是土耳其医学协会主席和创始成员，也是土耳其人权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土耳其人权基金会记录酷刑案件，并为侵犯人权和酷刑行为受害者提供康复和法律援助。作为土耳其医学协会创始成员之一，她协助编写了《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这是一套关于酷刑案件调查和文件记录的国际准则。她一直站在土耳其维护人权的最前线，并调查和揭露了许多国家的酷刑事件。

134. 根据收到的资料，2016 年 6 月，两名人权维护者和另一名同事因涉嫌参与宣传恐怖主义而被拘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第一刑事治安审判机关做出裁决后被捕。两名人权维护者在第一次庭审时接受了讯问，内容涉及参与 Özgür Gündem 报表达自由和声援运动和发挥编辑作用。两名人权维护者被指控“煽动犯罪”、“颂扬犯罪和罪犯”以及“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进行宣传”，根据《反恐怖主义法》应予以处罚。

135. 2019 年 7 月，法院宣判 Önderoğlu 先生、Fincancı 女士及其同事无罪，理由是缺乏证明他们与所涉出版物有关联的实质性证据。但 2020 年 11 月伊斯坦布尔地区上诉法院推翻了将两名人权维护者无罪释放的判决。对 Önderoğlu 先生和 Fincancı 女士的重审于 2021 年 2 月 3 日开始，他们可能被定罪，面临长达 14 年的监禁。

⁵² 见 TUR 9/2021。

⁵³ 同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36. Mohamed Abdullah al-Roken⁵⁴ 是一名人权维护者、律师和学者。在开展法律工作期间，他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和人权维护者提供法律援助，最著名的是“阿联酋 5”和“阿联酋 7”(分别因批评政府政策和加入改革和社会指导联合会而受迫害者)案的一些人。在该国的法学家协会于 2011 年被当局解散之前，他曾担任该协会主席，也是国际律师联盟和国际律师协会前成员。他还撰写了关于人权、国际法和反恐的书籍。

137. 根据收到的信息，2013 年 7 月，Al-Roken 先生被阿布扎比的联邦最高法院国家安全分庭判处 10 年监禁，并被禁止以律师身份执业。在“阿联酋 94”案的审判中，他与其他 64 名被告一起被判刑，罪名是“密谋反对政府”，因为他在 2011 年 3 月签署了一份呼吁该国民主改革的在线请愿书。他被定罪的依据是在审前羁押期间据称利用酷刑获得的自证其罪的供词。他于 2012 年 7 月首次被国家安全官员逮捕，此后在不明地点被关押三个月，与家人或律师没有联系。

138. 自 2013 年 3 月以来，他被关押在 Al-Razeen 监狱。这所监狱在沙漠中，意味着囚犯会受到极端温度的影响；报告显示，狱警在高温期间故意关闭被拘留者的空调。

139. 2015 年 11 月，据报监狱当局在 Al-Roken 先生的牢房内数小时播放声音极大的音乐，导致他失去知觉。据报，夜间对牢房进行了暴力搜查，狱警对包括 Al-Roken 先生在内的被拘留者进行身体和言语攻击。

140. 他的家人最近一次去监狱探视是 2020 年 3 月，自那以后一直无法探视，原因是与 COVID-19 有关的措施阻止探视。据报，自从他被拘留以来，他的家人也被当局骚扰。

越南

141. Tran Huynh Duy Thuc⁵⁵ 是胡志明市一名人权维护者，他用笔名 Tran Dong Chan 发表关于越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博客。根据收到的资料，他于 2009 年 5 月 24 日被捕，据称在审前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目的是逼供。他最初因“盗窃电话线”被捕，后来根据 1999 年《刑法典》第 79 条被控犯有颠覆罪。2010 年 1 月 20 日，他与 3 名同案被告在胡志明市高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处 16 年监禁，缓刑 5 年。

142. 在被监禁期间，Tran Huynh 先生受到严苛对待，经常因为倡导其他囚犯的权利而成为目标，他与家人的沟通受到当局的限制。2016 年 5 月，他被转移到离家人更远的监狱。转移原因尚不清楚。

⁵⁴ 见 ARE 1/2021、ARE 3/2019、ARE 4/2013、ARE 1/2013 和 ARE 7/2006。

⁵⁵ 见 VNM 4/2016 和 VNM 1/2010。

7. 政府对发出的信函的回应和关于长期案件的倡导努力

143. 各国对特别报告员发出的有关人权维护者被长期拘留的信函的回应是否认、驳回和拒绝互动。

144.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已收到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期间发出的 28 封信函的 11 份答复。在收到的答复中，绝大多数是完全实质性或部分实质性的。“实质性答复”是指对指控作出全部或部分答复和(或)实质性澄清事实的回函。但这并不意味着所采取的行动一定符合国际人权法。

145. 特别报告员赞赏地注意到地方、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将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案件列入国际政治和媒体议程方面所做努力。

146. 一些国家重新评估了监禁人权维护者的决定。特别报告员意识到各国国内经常存在辩论，即希望拘留人权维护者的官员与希望维护国家所承诺遵守的国际标准并释放人权维护者的官员之间的辩论。特别报告员欢迎最近布隆迪、埃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一些国家的人权维护者获释。

147. 特别报告员重申，如果各国正确行事并释放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她将对这些积极行动给予公开肯定。

148. 2020 年 11 月，埃及非政府组织埃及促进人格权倡议的 3 名人权维护者 Karim Ennarah、Mohammed Basheer 和 Gasser Abdel-Razek⁵⁶ 被捕，一些议员、联合国独立专家、知名人士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将其释放。他们于次月获释，但在编写本报告时，对他们的指控尚未撤销。

149. 2018 年，人权维护者 Germain Rukuki⁵⁷ 因与国家安全罪有关的捏造罪名被判处 32 年监禁。联合国独立专家以及各国议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持续倡导将其释放，此后 2021 年 6 月他的刑期被减至一年，并于当月晚些时候获释。

150. 年复一年地不断提及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的案件，并且往往收效甚微，是一项费时费力的艰辛工作。特别报告员赞扬旨在提醒人权维护者他们没有被遗忘以及敦促将其释放的许多举措。

151.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国际奖项在关注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人权维护者告知特别报告员，获奖或被提名如何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士气。

152. 特别报告员鼓励开展侧重于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的进一步努力，并敦促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继续敦促各国释放人权维护者，包括让媒体关注这些案件。

⁵⁶ 见 EGY 15/2020。

⁵⁷ 见 BDI 2/2020、BDI 1/2018 和 BDI 2/2017。

153.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各国议员为提请关注原本会“被遗忘”的、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所作的努力，并再次注意到被拘留者及其家人和同事向她报告的上述举措的积极影响。

154. 特别报告员鼓励开展更多此类举措，其中国际、国家和地方的议会议员和委员会成员定期倡导释放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这些举措包括美国众议院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管理的捍卫自由项目，在该项目中美国国会议员就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和其他囚犯开展倡导工作。⁵⁸

二. 结论和建议

A. 结论

155. 许多政府未能履行其法律义务和道德上的义务，它们判处人权维护者长期监禁，之后又否认自己采取了此种行动。

156. 这主要是因为存在一种政治意愿，即压制和平捍卫他人权利的人，而且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承担的后果微不足道。各国可以而且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做法，并废除使之成为可能的机制，包括针对人权维护者滥用反恐立法和其他国家安全法律、进行不公正审判和逼供以及拒绝给予人权维护者诉诸法律的机会。

157. 对人权维护者实施长期监禁会摧残生命并破坏家庭和社区。各国应立即并永远停止这种不可开脱而且无法辩解的可鄙做法。

B. 建议

158. 各国应：

- (a) 停止因人权维护者的合法人权工作而将其监禁，停止长期拘留人权维护者；
- (b) 立即无条件释放目前被拘留的所有人权维护者；
- (c) 停止对人权维护者进行不公正审判；
- (d) 停止为获取不实供述或出于任何其他目的使人权维护者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e) 停止剥夺人权维护者的合法权利，包括迅速接触其律师的权利；
- (f) 停止因人权维护者开展合法的人权工作而使用不明确的反恐、国家安全和其他法律将其监禁；
- (g) 停止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人权维护者；
- (h) 为人权维护者提供独立的法律援助；

⁵⁸ 见 <https://humanrightscommission.house.gov/defending-freedom-project/prisoners-by-country>。

(i) 针对在人权维护者案件预审和审判阶段对人权维护者开展诽谤运动的媒体机构采取适当措施；

(j) 向所有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提供适当照顾，包括确保他们能够：

(一) 接触家人，尤其是身为父母的人权维护者可定期接触子女，并确保他们被关押在离家乡较近的地方，而不是为实施进一步惩罚将其转移至该国其他地区的监狱；

(二) 打电话；

(三) 获得阅读材料；

(四) 获得医疗；

(五) 因残疾相关需求获得适足援助；

(六) 获得适足营养；

(七) 获得适足卫生设施；

(k) 允许联合国、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其他国家政府的外交官探望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

(l) 经常就人权维护者在促进正义、平等、问责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发表公开声明，声讨威胁和攻击人权维护者的行为；

(m) 不根据政治选择性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确定案件的优先重视程度，而应处理范围广泛的案件，无论人权维护者是被盟友还是被对手关押。

159. 开展倡导工作的政府应：

(a) 经人权维护者同意，定期公开呼吁释放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

(b) 向其他国家提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的案件；

(c) 要求允许本国官员探望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

(d) 在政府代表观察到对人权维护者的审判符合国际法律标准的情况下，做出公开表示。

160. 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应：

(a) 在人权维护者被逮捕时，立即代表被拘留者动员各方给予高度关注和采取果断干预措施；

(b) 邀请人权维护者的亲属在国际论坛上发言；

(c) 在媒体上提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权维护者的案件。

161. 此外，非政府组织和努力使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获释的其他各方应考虑采取更协调一致的行动。例如，人权维护者纪念项目协调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

以纪念遇害的人权维护者，但非政府组织很少为被监禁的人权维护者采取这种集体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汇集资源和信息，并共同开展倡导工作。

162. 议员和其他当选机构成员以及包括工会在内的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应长期关注被拘留的人权维护者，(经人权维护者同意)在公共和私人论坛上提出他们的案件。
